

纸弹力能挫暴 笔垒亦可却敌

——《战时记者》关于“新闻武器论”的研究

蔡 罕

摘 要：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梳理了《战时记者》关于“新闻武器论”的研究。一是分析了《战时记者》对“新闻武器论”学理之源的探究，阐述了《战时记者》关于宣传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发展性认识，剖析了《战时记者》对“新武器”理论学术内涵的充实与发展；二是总结了《战时记者》对战时新闻发挥“纸弹”“笔垒”效应的实践性指导。

关键词：《战时记者》；战时新闻学；新闻武器论；宣传战；纸弹；笔垒

作者简介：蔡 罕，男，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6) 03-0002-08

一、引 子

《战时记者》是抗战时期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于1938年9月1日在浙江金华创办的新闻专业刊物。该刊“旨在研究新闻学术，加强战时宣传”^[1]，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持续办刊3年，刊载了一系列“有关抗战建国宣传，及中外新闻事业之理论与实际”^[2]的文章。这些文章，随着《战时记者》拂开历史的封尘，已成为今天研究战时新闻学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所谓“战时新闻学”，是指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我国新闻界的学者对新闻事业所进行的“工具理性式”的思考与研究。正如任毕明在1938年出版的《战时新闻学》一书中所说：“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而斗争的战争工具。”^[3]基于这种“工具理性”的思考，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所建立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抗战时期，开始让位于“新闻工具主义”，新闻界主动放弃新闻自由，服从新闻统制，视新闻为武器，积极开辟宣传与舆论战场，发挥新闻在抗战中的“纸弹”与“笔垒”效应。因此，战时新闻学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观点就是“新闻武器论”——新闻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一种战争工具。这种观点是新闻“工具论”在抗战时期的升级体现，它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新闻工作者以新闻宣传为武器，自觉地担负起“反侵略，谋自卫，求生存”的神圣职责，开辟抗战新战场的斗争气概。作为新闻专业刊物，《战时记者》在创刊号上就打出了“纸弹力能挫暴，笔垒亦可却敌”的口号，它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不仅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新闻武器论”的观点，论证了新闻是抗战的一种“新武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从实践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新闻现状提出了批评，并就如何发挥新闻宣传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在此，笔者仅就《战时记者》关于“新闻武器论”的研究文章作一梳理，以期揭示战时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

二、《战时记者》对“新闻武器论”的理论性探究

（一）探求“新闻武器论”的学理之源

抗战时期，国人对“新闻武器论”的理性思考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孙子兵法》，二是欧洲大

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外战史。这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是战时新闻学构建“新闻武器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外战史上宣传与外交攻略的成功案例，则给“新闻武器论”提供了殷实的史鉴。

首先，抗战时期的学者在《孙子兵法》中找到了“宣传战在战争底价值”。叶式凝在《攻略战思想战与攻势宣传》一文中说，“宣传的价值等于武器，……在我国古代兵家早已注意了”。这里的“古代兵家”，指的就是春秋时期的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叶氏对《孙子兵法》开章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进行了有时代意义的阐述：“治国练兵，须要有道，才能上下一心，举国一致，不畏艰危。换句话说，要能够使群众（兵是包括在内），明瞭战争底意义，不是为某一特殊阶级或少数人的利益，是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的，那末，他们自然是不顾生死地始终奋斗到底，以求最后的胜利。这使群众明瞭的‘道’，就叫做宣传，亦就是宣传底功效，这功效在近代新名词来说，就叫‘统制国民思想’。”^[4]接着，叶氏将《孙子兵法》中的“伐交”也列入宣传战的范畴，他针对《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道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进行了解说：“伐交就是用宣传战离间敌国所交与的邻国，使其在急难时候不复相交的意思。这都是包含有政略战和思想战在内，而是收了宣传效果底战事的”^{[4]（15-16）}。总之，抗战时期的学者将《孙子兵法》中所谓的“道”与现代战争中的“宣传”联系起来，他们不仅从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中找到了“攻心为上”、“先声夺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争智慧，而且也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了构建“新闻武器论”的学理依据。

其二，中外战史为“新闻武器论”提供了丰富的史鉴。在中国战史方面，有学者例举了“武王伐纣，三千人为一心”，就是通过宣传，而获得“上下同一”，“统制国民思想”的效果；战国时期秦国张仪诈以商於六百里贿楚，使与齐绝交，以后秦伐楚，齐国遂不相救，是中国古代战史“伐交底好例”^{[4]（16）}。当然，在《战时记者》所发表的有关新闻战、宣传战的文章中，更多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及新闻宣传在“欧洲大战”中的作用。比如，叶式凝认为，在欧战前期德国之所以能取胜，固然发挥了飞机、坦克在战争中的威力，但是，“他能不大费力而并吞奥国、捷克、波兰、丹麦、挪威等国，及使比利时脱离了联军，和煽动法国而促成其投降，这完全是德国利用政略和思想的宣传效果了”^{[4]（15）}。同样，在欧洲大战中德国最终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输在了协约国方面的宣传战上。在《战时记者》的诸多文章中，笔者注意到有两句话的引用频率最高，一是德皇威廉二世所说的“德国的所以失败，不是军事上不及协约国，而是没有伦敦泰晤士报”；二是德国名将鲁道夫所说的“欧战时同盟军的失败，不在于前线战斗的挫折，而在于国际宣传的缺如……”。德方在总结其欧战失败的原因时也一致认为“是因为没有一个‘路透社’和‘泰晤士报’”^[5]。的确，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的宣传阵营，路透社则是英国加强对外宣传、赢得中立国同情和支持的利器。尤其是它在向美国宣传时提出“英美同文同种，应该互相合作”^[6]的口号，打动了美国人的心，从而坚决地加入到协约国来共同对德宣战；而伦敦泰晤士报则“把英国人民组织在战争机构里，能够动员人民忍受战争的苦痛，克服战时的困难”^[7]。相反，德国纳粹的宣传部则是个“说谎部”。虽然该宣传部的档案“是第三帝国领袖所要知道所要使用的一切东西的来源”，但是它“搜集了这么多消息，只是要瞒过德国人民，或者将消息改变了内容与形式再给人民看”^[8]。所以，纳粹的宣传纯粹是为了造谣，这种宣传可能会对战局起着一时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只会失信于人，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中外战史，尤其是欧洲大战中宣传攻略的成功案例就成为战时新闻学构建“新闻武器论”的重要史实依据。《战时记者》中的许多文章就是从借鉴、学习欧战新闻报道的经验与宣传策略出发来阐述如何发挥“纸弹”与“笔垒”在抗战中的作用。比如，谷风的《在欧战中学习》一文，明确提出：“此次欧战中各国关于战讯之报道，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

方”^[9]；福民的《加强宣传战线》一文则分析了从欧战前期交战国的宣传“大概都是造谣式的宣传”，到1918年英德“两方的军事战均达极疲乏”之际，英国“转变作风，凡事宣传都依靠诚实的凭据”，最终赢得欧战胜利的史实出发，提出中国的对倭抗战，也要“以真实为基础，加强我们的宣传战线，争取最后胜利”^[10]。

总之，《战时记者》对“新闻武器论”的研究，既有中国传统兵家理论的滋养，又有丰厚的史实作为史鉴，这就使得该理论的阐发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

（二）从现代战争的“三位一体”到“宣传重于作战”的认识发展

关于宣传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是战时新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闻武器论”的主要内容。纵观《战时记者》对宣传战的研究，笔者以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抗战时期的新闻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与时俱进的认识发展过程，即从现代战争的经济、军事、宣传“三位一体”论到“宣传重于作战”的认识发展过程。

在抗战前期，中国的新闻学者从欧洲大战的经验出发，认为宣传在现代战争中与经济、军事等要素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一个国家要在现代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仅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而且还要发挥新闻宣传这颗“纸弹”的威力。在《战时记者》诸多研究宣传战的文章中，《战时记者》主编杜绍文的《论金铁与纸》是一篇重要的文献。该文在开篇“释题”中引用了英国名记者李特（Lerter）的话：“在战斗的准备上，必须具备金钱、钢铁和报纸这三大要件。”这也就是说，作者认同李特的观点，认为现代战争已不是“军事上的单纯动作”，它需要经济、军事、宣传等方面的准备。在经济、军事、宣传三者之间，杜氏引用《孙子兵法》中“攻心为上”的观点，认为经济和军事固然是“战争中制胜的因素”，但是“其最后决胜工具，则有赖于报纸的宣传”。在当时抗战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我方“物质之准备不如人，军事之装备更不如人”，这就需要我方“以攻心的纸弹，俾济战场上子弹之穷”，充分使用“纸弹”的威力。这个“纸弹”就是报纸的宣传。杜氏认为，这颗“纸弹”之所以“力能挫暴”，其威力不在于火药和铅头，而是来自于“正义和事实”，“以正义制裁侵略，以事实揭破阴谋”。虽然敌人“在子弹上稍占便宜”，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在“纸弹方面”，他们“则大败特败”，因为“全球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们，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援华反日的运动，更如火如荼普遍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纸弹已经攻陷敌人的心房了”。^[11]

另外，程君甫在《宣传战与火药战》中也论述了宣传战与火药战的关系，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宣传战”与“火药战”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文章指出：“火药可以摧毁敌人的工事及顽寇的躯干，而笔阵纸弹则可以坚定人民的意志，增强抗战的决心，涣散敌人的精神，诱致友邦的同情”。宣传战“它所有的手段是阐明的，辩论的，诱导的，挑拨的，它在战斗中的地位，与军队之进攻，处于同等的重要。假使我们以为火药是‘刚’的，那末宣传战是‘柔’的，刚柔相济，故能事随心愿，建立奇功”^[12]。所以，在抗战中“必须把宣传战火药战相互配合起来，运用起来，方能把握着最后胜利的到来”^{[12]（6）}。

随着1938年10月武汉的沦陷，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适时发出了“精神胜于物质，宣传重于作战”^[13]等一系列指示。笔者以为“宣传重于作战”的指示则是抗日相持阶段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首先，相持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中日战事的旷日持久，中国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用宣传教育每一个同胞，觉醒其民族精神，使其树立起抗日建国与抗战必胜的信念。其次，汪精卫的投敌与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使得汉奸报纸大量出现，不断对沦陷区的民众实施奴化教育。因此，反击“汉奸报纸的邪说，敌方广播的谰言”，就必须扩大抗战的宣传阵线，在西南后方、沦陷区，再到敌后广袤的乡村与海外建立坚强的抗战“笔垒”与宣传游击队，“以舆论的正确，揭破倭寇的阴谋，使民众不为所惑，知所适从”^[14]。正因如此，《战时记者》自创刊以来，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开辟“专题笔谈”，邀集各方人员，“广征海内贤达高见”，就如何推进战时新闻事业，发挥宣传在抗战中的作用开展专题

研讨。譬如，1938年11月，《战时记者》在首卷第3期专辟“报纸和民众怎样联系起来？”之特辑；1939年1月又将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举行的“战时报人如何贯彻所负使命？”专题笔谈掲載于《战时记者》首卷第4期。其中，余鸣时的《报人入伍与报人下乡》一文，就反映出当时新闻界加强对建立阵中新闻与敌后宣传的一种呼吁。自此之后，《战时记者》中关于如何加强地方报、敌后报建设与改革的文章几乎每期必见。1939年9月后，关于揭露汉奸报纸，肃清汉奸的流毒，开展消灭汉奸报运动的文章也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在“宣传重于作战”指示下新闻界加强抗战宣传对策研究的一种学术动向。

（三）充实、发展“新文器”理论的学术内涵

1938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任毕明《战时新闻学》一书就把战时新闻比喻成“新文器”，并列有“建立我们的新文器”一节。《战时记者》创刊后则进一步完善了“新文器”理论的构建。其中，首卷第3期所发表的杜绍文《新文器和新武器》一文，则进一步充实、发展了“新文器”的学术内涵。

首先，杜氏在《新文器和新武器》一文中提出“文字并不弱于武器”的观点。他分析了欧战中，以著名报人北岩爵士所主持的英国宣传部所发动的宣传战在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联军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宣传战、新闻战的文字工具”，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效能并不低于毁灭敌方的飞机战车，且文字图书等无血的战争，其效力有时竟驾流血的武器之上”^[15]。所以，杜氏把“报纸、杂志等文字图画出版物”都看成是“新文器”，认为“新文器”在抗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实与当时战场上出现的各种“高武器、重武器、毒武器”等“新武器”相伯仲，“新文器既是可与新武器并驾齐驱，且新文器的威力亦不亚于新武器。”^{[15](4)}

继而，杜氏分析了新闻宣传这种“新文器”的结构。认为“新文器”由新闻事业、新闻记者、新闻教育等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事业系新文器的基干，新闻记者为运用新文器的兵员，而新闻教育，则是训练新闻记者的技术，使能制出一张力量较大之新闻纸，从而促进新闻事业的发达。”从发挥战斗效用的角度来看，“新闻记者系新文器的战斗员，新闻教育系新文器的训练部，而新闻事业则一面系新文器的实习场所，一面又是新文器的作战疆场。”至于新闻政策，杜绍文则认为是“使用新文器的战略”^{[15](4)}。

最后，杜氏认为，“新文器”可从“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发挥其功效。消极方面，“为彻底摧毁敌对的势力”，可以“鼓吹有利于我的宣传”，“暴露敌人所有的弱点”，“争取第三者的对我同情，令进一步化同情为辅助”。积极方面，则可以“提高自己的信心，毅力和警觉性，确保最大胜利的及早到来”；“瓦解敌方的内部，使其由内溃而不能外攻，可一举而击溃使之屈服”；“提示我之必胜与敌之必败，助我之利与中立之害，使第三者自无碍于我的中立，进至有助于我的帮忙。”^{[15](4)} 这些观点对于正确发挥战时新闻宣传的“纸弹”功效，均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战时记者》中的“新闻武器论”，已经突破了纸质媒体的限制，出现了关于广播、无线电报、电视、电影等“新媒体”的研究成果，并将广播的“肉声宣传”称为“电枪”。《战时记者》首卷第3期曾专门开辟“电枪与子弹”的特辑，以《肉声宣传的伟大效能》《飞天爆竹和无线电波》两篇文章来论述无线电波在宣传功能上带来的伟大效应。以后相继又有介绍无线电报、广播电台、新闻电影的文章发表。其中，王承樟的《无线电在战争上的重要性》一文认为，“无线电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力量，超越最大的空间，且具有简单迅速及秘密的优美条件，特别适合我国地广人稀而又交通不便的客观情势”^[16]；韩志大的《国际宣传生力军 中央短波广播大电台》一文，则介绍了当时中央短波广播大电台“每日用二种波长放送，呼号为XGOX和XGOY，电力三万五千瓦特，独步东亚，十种语言定向放送，音遍全球”^[17]；列齐的《战事新闻片之战》则全面介绍了“欧洲大战”爆发后，战事双方运用新闻电影开展“宣传战”之情况。首卷第8期，杜绍文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站在

学术的角度,评述了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及各自的优点,在二者与报纸的比较中,他认为,这两种刚兴起的“新媒体”,与以文字报道见长的报纸,存在着既竞争又统一的关系。报人“不特不能仇视这两种科学的新利器,相反的,必须引为亲挚的同伴”,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田地里持续不断的新鲜性。^[18]

三、《战时记者》对战时新闻发挥“纸弹”“笔垒”效应的实践性指导

《战时记者》对“新闻武器论”除了理论性的研究,更有对战时新闻如何发挥宣传效应,使其成为抗击敌寇的“纸弹”“笔垒”的实践性指导。笔者以为,这种“指导”在《战时记者》所发表的文章中实际上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学者对战时新闻报道失误的“检讨性”指正,二是对如何加强抗战宣传的正面引导。现将《战时记者》对战时新闻发挥“纸弹”“笔垒”效应的实践性指导分析如下:

(一) 对战时新闻宣传缺失的“检讨性”指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双方在新闻力量的对比上,中方不仅在新闻实力与装备、随军记者的数量等方面远不如日本,而且在战时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中出现了各种缺失,正如杜绍文在《战时记者》创刊号发刊辞所说:“我国过去反侵略的宣传,组织欠完善,工作欠紧张,联络欠密切,内容欠充实,手段欠敏巧,范围欠广泛,一切侦察、分析、统计、研究、归纳、诊断、策应、交际、分配等工作,类皆未能恰到好处。”^[19]这些缺失严重影响了战时新闻的宣传功效。针对这一情况,《战时记者》的诸多文章对战时新闻宣传的缺失进行了“检讨性”的总结,并提出了指正的意见。其中有3篇文章切中时弊,鞭辟入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其一是《战时记者》创刊号上发表的署名“彬”的《论战时报道工作》。该文检讨了抗战以来战时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中的缺失,总结出四种“应忏悔”的现象。一是不能对抗战以来社会上所形成的“种种非常的现象,变态的情绪,和特殊的问题”,“一一加以正确的指导、分析和解答”,进而不能“巩固抗战阵线,增进抗战力量,驱除抗战阻碍”;二是对我军的战功“恣意夸耀,尽量渲染”,“助长了侥幸轻敌的投机心”;三是对于种种时弊,“只见有纯理论的高调,而不见有更具体的摘发”;四是在对外宣传方面,“实在不足和敌人较短长”。作者认为,造成这些缺失的原因,有记者自身的因素,也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因素。最后文章将矛头直接指向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出“新闻检查制度不改良,在民众心目中,自办报纸的信用必将永远低落,无法恢复。”^[20]

其二是《战时记者》第一卷第2期署名“鹏”的《让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该文检讨了抗战一年来新闻工作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新闻工作未曾配合抗战的需要”。“自抗战以来国内已无发行五万以上的日报”,这种“量的贫乏”,使得“每天能举着报纸读的人太少”。至于前方将士们,“简直连一月前的废报也高兴读”。这就看出“新闻事业尚未能普遍社会的需要,尚未能踏实负起全面抗战中的宣传责任”。其次,“报道方面还不够忠实”。“所有报导战况的消息,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绩”,不能客观地反映实际的战况。“除了少数战地通讯中真能暴露事实外,其余的战讯,可以说是向读者们拉了许多谎”。作者希望社会人士,“对新闻事业加以极严格的批评与鼓励”,要求“每一个新闻从业员,自己检讨工作的优点和缺点,作有效的建议与改革。”^[21]

其三是杜绍文在《战时记者》第二卷第4期发表的《一个比较的研究——泛论战时新闻的题材》。该文对战时新闻报道所存在的“四个显著的毛病”进行了学理性的总结:第一是公式化。作者指出当时的新闻报道、“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六个阶段”的“叙述新闻的公式”: (1) 溯自“七七”抗战以还,或更远的推到“九一八”去; (2) 我被迫忍无可忍而战; (3) 敌人的种种残暴; (4) 我愈战愈强,敌则越打越弱; (5) 从国际、敌邦和自己等三方面,证明我操有利的条件; (6) 最后胜利必

属于我。这种“陈腐的‘抗战八股’，不易使人动听”。第二是夸大化，对于什么事情，均先存一个“主观”，忽略了客观的现实。作者指出，这种夸大事实之新闻题材，“往往仅能取快于一时，而不能维持兴奋的士气与民心于永久，这都是深中‘夸大’之毒”。第三是表面化，只是触及事物的浮面，没有探测其里层，因此常易受直觉和幻觉之害。针对“战后我国新闻的题材，屡次肯定敌国人力已竭，物力亦穷，财力更窘，而断定敌国之必败，由敌之必败而断定我之必胜”的虚浮现象，作者批评道：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议论，直是空论”。认为“这亦是不可恕的错误，没有从‘深入’下功夫”。第四是贫乏化，报人仅能在后方记述熟知的事情，或到前方的后方写一点“烂闻”，离开新闻的“新”字不知相去几千万里，能到前线军部抄新闻，已是最前进的记者了。这是质的方面之贫乏。至于量的方面，创作不多，纪录不广，描摹又不深刻，不能满足战时人们的饥渴。作者举例说：“就台儿庄血战来说，最先到达该处的，纯系外国记者。最后总算到了十余人，亦只是在战场上巡礼一周，撷取一点点的战事新闻而沾沾自满，千篇一律的都是强调着胜利，没有一个报人，能注意到胜利后边的黑暗面。”^[22]

（二）对加强抗战宣传的正面引导

除了上述对抗战新闻宣传工作的“检讨式”的批评与指正，《战时记者》也更多地发表了如何加强抗战宣传的正面引导文章。现将这些文章梳理如下：

其一是提出抗战中的报纸要实行“战时化”。持此观点的主要有钱震《抗战中的报纸》一文。该文首先认为抗战中的若干报纸可以“联合出版”，即使“在不能联合出版的场合下，却也应该作最大可能的合作”，这样“一方面可减少消耗”，另外“可以加强服务效能”。其次，提出“要送报纸到前线，让前方将士看到报纸”，使其“脱离闷葫芦的苦海，并振起勇气与敌人作抵死之周旋”。第三，战时报纸要有“牺牲的精神”。一方面是报纸的“守土职责”，在战事并非绝对紧张时，报纸要“立定足跟，照常执行任务，不应大惊小怪，动摇人心”；另一方面，在报纸的定价上“应力求低廉”。文章还提出战时报纸的社评或专论，对于时事的论断或解释，不应采取过激的口吻，“相反的却要绝对冷静，由冷静产生正确的观察”。就战局而言，“不论如何，不应无条件的悲观或乐观。要于精密研讨之后，再下断言，这样社会才不会误入迷途。”^[23]

其二是提出要“净化”抗战舆论。《战时记者》创刊号《舆论之净化》一文认为在抗战时期——“一个关系整个民族存亡祸福的紧急关头”，应该以“特别审慎与严正”的态度注意舆论。它要求人们“应该赞助与遵守政府一切指导报纸舆论的方针”，认为要做好舆论的净化，“一方面要靠当局严正的监督，一方面要靠报人本身互相检举，互相批判，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由民众来监督、检举、批判、制裁。”^[24]《战时记者》主编杜绍文则在《一个民族 一个意志 一个舆论》一文中对如何“净化”抗战舆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文章指出：抗战时期报人“当前神圣的职务”，就是要“爱护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增强一个意志——战斗意志，鼓吹一个舆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战时如是，平时亦如是，我们要发挥纸笔的威力，缔成‘一个民族 一个意志 一个舆论’。”^[25]另外，杜绍文在《论金铁与纸》一文中就抗战的宣传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宣传的原则要单纯，宣传的方法则要统一集中与普及。”^{[11](27)}

其三是要扩大与加强抗战的新闻战线与宣传阵地。首先，要求报纸下乡、新闻记者下乡。星光的《报纸下乡去》一文针对后方民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与报纸绝缘”，以致“造成了民众对于国事的淡漠，而且听信奸人煽惑而步入人生悲惨之途”的情况，提出要“加紧乡村宣传”。文章认为“把大量报纸向乡村输送，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急务”，因为“它不特在提供广大民众以正确消息，灌输民族意识，培养爱国观念，众所焦虑的民众麻木问题，汉奸问题，统可迎刃而解，且进而把他们动员起来，与军事进展得到配合，抗战力量，必可因此加强。”^[26]赵家欣的《建立强大的新闻阵线》一文则提出，“支持抗战的基本力量，在于广大的农村”，为了动员支持抗战的基本力量，新闻记者除了“应该尽量地入

伍去”，还必须下乡去。第二，要加强地方报、战地报与敌后报纸的建设与发展。抗战爆发一年多后，一方面全国报纸总数由战前的1014家，减少了600家左右，另一方面地方报、战地报和敌后报却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而不断兴起。以浙江省为例，战后有“二十八家大小报纸被摧残”，但是全省报纸的总数却不减反增，有“大小一百八十家报纸，每县都有了地方报”^[27]。虽然这些新兴的地方报、战地报与敌后报纸大都是小型油印报，但在抗战宣传中却发挥着“新闻游击队”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这些报纸的建设，发挥这些“轻骑兵”的宣传作用，就成为抗战时期新闻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正如王文彬在《今年的“记者节”》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具备的学识与所经历的经验，都不够应付目前艰巨的新闻工作。因为怎样改进地方报，怎样在前线办报，怎样深入敌后在游击区办报，怎样在敌人侵占的城市或乡村中取得宝贵的新闻资料，怎样编辑适合士兵阅读的报纸，怎样写鼓励民众踊跃参加抗战的评论，怎样改进印刷技术，怎样打破发行上的困难……，都是我们应该急切研究解决的。”^[28]正因如此，《战时记者》发表了诸多关于如何办好地方报，加强敌后新闻工作的文章。比如，邵鸿达的《谈谈地方报纸的改革》一文，就地方报（县报）在投递、内容、评论上的困难，谈了自己的改革意见。^[29]谷风《对于地方报诸问题之意见》则提出办好各类地方性报纸的主张，即“努力于‘地方性’的建立”。^[30]刘志坚的《加强敌后新闻工作》一文，则要求敌后新闻阵营上的每个工作同志，“把新闻阵地更广泛地建筑起来”，“把锋利的笔尖去戳穿敌人假道义的‘宣抚’和伪组织的假面具等等，在每一个沦陷区的角落里，对自己的同胞，燃烧着不愿做奴隶的火焰”。^[31]

其四是要注重抗战宣传事实的真实性。正如上文所述，宣传作为“纸弹”的威力来自于“正义与事实”的力量。因此，为了正确发挥新闻报道与舆论宣传在抗击敌寇中的作用，《战时记者》的诸多文章提出了要重视抗战宣传真实性的问题。比如，福民的《加强宣传战线》一文在总结英国在欧战中宣传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于“宣传的运用，要特别慎重”。文章认为：“宣传的第一要则是单只照着真实来宣传；第二要则是在宣传里面不可有矛盾的事情。”^[32]谷风的《在欧战中学习》一文，则借鉴欧战中各国关于战讯报道的成功经验，指出“不文饰自身之弱点，同时也不藐视敌人的优点，为英法战时记者用心所在”。文章认为“在无伤于军事秘密原则之下，每一战役之胜或败，皆应正确地并批判地宣布其真相”，而“过度夸大胜利，或者讳言失败，俱足以发生至恶之影响。”^{[9]〔7〕}这些基于史实的论述对于抗战宣传无疑起着正确的指导作用。

四、结 语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届七十多年，我们重温历史，梳理抗战时期的新闻学人对“新闻武器论”的探讨与研究，心里充满对当年奋战在抗敌前线，转战于西南后方、敌后根据地，以及沦陷区的抗战新闻与宣传工作者的敬意。抗战以来，随着国土的沦陷、时局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但是，抗战也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正如《战时记者》主编杜绍文所说，“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新闻学”自传入中国后，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停留在转译外国新闻学术的阶段”，抗战爆发后，中国新闻学术从抗战的烽火中“方开始了创造的前途”^{[27]〔8〕}，涌现出许多对抗战新闻事业有着正确指导作用的著述与学术期刊。比如，任毕时的《战时新闻学》、赵群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陆诒、邵宗汉、秋江等所著的《新阶段一般新闻探访要旨》等等。可见，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抗战时期是新闻学迈向“中国化”道路的开始，“战时新闻学”就是中国新闻学者基于抗战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新闻学这一西学舶来品进行改革与创新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新闻事业所进行的“工具理性式”思考与实践的发展。从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新闻“喉舌论”到抗战时期的“新闻武器论”，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在中国近代化曲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一脉相承的工具理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佚名. 本刊重要启事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6、7、8期合刊), 1940: 17.
- [2] 佚名. 征稿简则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32.
- [3] 任毕明. 战时新闻学 [M]. 上海: 光明书局, 1938: 4.
- [4] 叶式凝. 攻略战思想战与攻势宣传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6期), 1941: 15.
- [5] 彭革. 抗战期中敌我新闻动态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6、7、8期合刊), 1940: 6.
- [6] 笑翁. 新闻与抗战力量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29.
- [7] 恽逸群. 辛亥革命以来之中国新闻事业概观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6期), 1941: 6.
- [8] 张振眉 (译). 纳粹宣传部的秘密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6期), 1941: 16.
- [9] 谷风. 在欧战中学习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3期), 1939: 7.
- [10] 福民. 加强宣传战线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2、3、4期合刊), 1940: 7.
- [11] 杜绍文. 论金铁与纸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3期), 1938: 1, 27.
- [12] 程甫君. 宣传战与火药战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3期), 1938: 3.
- [13] 孟锦华. 抗战三年来浙江新闻事业概况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10期), 1940: 13.
- [14] 杜绍文. 战时报学讲话·前言 [M]. 上饶: 战地图书出版社, 1941: 2.
- [15] 杜绍文. 新武器与新武器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10期), 1939: 3.
- [16] 王承樟. 无线电在战争上的重要性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5期), 1939: 27.
- [17] 韩志大. 国际宣传生力军 中央短波广播大电台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1期), 1939: 18.
- [18] 杜绍文. 敌乎? 友乎?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8期), 1939: 4.
- [19] 杜绍文. 记者节与反侵略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1.
- [20] 彬. 论战时报道工作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3.
- [21] 鹏. 让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2期), 1938: 2.
- [22] 杜绍文. 一个比较的研究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4期), 1939: 3.
- [23] 钱震. 抗战中的报纸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4-5.
- [24] 佚名. 舆论之净化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26.
- [25] 杜绍文. 一个民族 一个意志 一个舆论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2期), 1938: 2.
- [26] 星光. 报纸下乡去 [J]. 战时记者 (创刊号), 1938: 14-15.
- [27] 范长江. 两年来的新闻事业 [J]. 战时记者 (第一卷第12期), 1939: 5.
- [28] 王文彬. 今年的记者节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2期), 1939: 21.
- [29] 邵鸿达. 谈谈地方报纸的改革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1期), 1939: 12.
- [30] 谷风. 对于地方报诸问题之意见 [J]. 战时记者 (第二卷第2期), 1939: 7.
- [31] 刘志坚. 加强敌后新闻工作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2、3、4期合刊), 1940: 17.
- [32] 福民. 加强宣传战线 [J]. 战时记者 (第三卷第2、3、4期合刊), 1940: 7.

〔责任编辑：赵晓兰〕